

三国至唐宋云南的交通、商贸与文化交融

郑畅

路通南北 道连中外

三国至唐宋时期，云南在秦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交通网络，形成北接川蜀、南通交趾、西连天竺、东抵海洋的格局，使云贵高原与中原、南亚、东南亚乃至印度洋沿岸紧密相连。唐代前期，对内贯通清溪关道，对外连接“西洱河至天竺道”与“安宁至交州道”，构建起纵横交错的干道框架。

自东汉以降，五尺道仍是内地入滇的主要通道。《华阳国志》记其水陆并行之险：水路盘曲如蛇，陆路山势骤升，沿途留有“中叩头”“马搏坂”等险峻地名。隋开皇五年(585)，朝廷派员率石匠重新开凿石门道，因陷通盐津县石门关(今豆沙关)最险而得名。唐樊绰《蛮书》载其“石壁直上万余仞，下临危握江流”。贞元十年(794)，袁滋赴南诏册封，于豆沙关留下摩崖石刻，见证古道沧桑。

牂牁道起自交趾，经益州郡北穿夜郎抵成都，为连接交趾与成都的干线。东晋以后，如繁板落、蜀中战乱，此道成为南朝建康与西南联系的重要通道，南北对峙二百余年，始终是连接内地的主要交通路线。

永昌道将云南与南亚商路相连，使永昌成为连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枢纽。《魏略·西戎传》载水道通益州永昌，“故永昌出异物”。此道西通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，南接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，连通印度洋沿岸，四方商旅汇聚于此，成为西南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。

唐初，唐朝与南诏积极经营“安南通天竺道”，使其成为唐代十大对外交通线之一。随着洱海地区成为云南中心，清溪关道(大理—姚安—西昌—黎州—成都)成为川西入滇主道。南诏崛起后，形成以自身为主体的对外交通体系，在安南通天竺道主干外，相继拓展经银生城出海通道，远通女王国、昆仑国，与南亚东南亚沿海诸国交往日益频繁。

大理国时期，交通更为发达。熙宁七年(1074)，杨佐至大理议买马，见大云南驿前里埃碑详载东至戎州、西至身毒、东南至交趾、南至海上的里程方位，足见其对外交通的完备与繁荣。

商旅辐辏 市易兴盛

三国至隋代，随着交通发展，云南商贸日趋活跃。永昌郡成为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重要枢纽，大秦、波斯商人经此输入海贝、琉璃、珊瑚等物品，云南所产盐狼“白铜”亦远销中亚、西亚。本土商帮逐渐兴起，推动农贸集市向区域性市场转变。连盐盐井行销南中，味县、朱提、晋宁等地亦发展为重要商贸中心。

进入南诏时期，主要城市不仅成为经济文化的核心，同时也是商贾货物的集散地与交通枢纽。龙尾城(今属大理)下临洱水桥，过桥后分三条道路：南往蒙舍，西去永昌，东抵白崖，一城通达三方，正是南诏贸易繁盛与交通发达的集中体现。随着商贸交流的日益兴盛，南诏还专门设立了管理贸易的职官——不末。南诏还开辟了被称为“北至大雪山

从三国到唐宋，云南凭借独特的地理区位，进一步完善了连接中原、南亚与东南亚的交通网络，依托石门道、永昌道、牂牁道和安南通天竺道等干道，云南不仅成为西南边疆的要津枢纽，也成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南、连通域外的重要通道。这一时期，交通、贸易与文化的互动日益紧密，展现出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活力。

道”的新道，可经丽江抵拉萨。吐蕃居民常驱赶两千头羊群，经由铁桥(位于今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)一带，前往洱海地区进行交易。这条商路必须穿越高黎贡山，当地商旅翻山越岭已成常态，一年四季寒暑交替，商客乃作歌曰：“冬时欲归来，高黎贡上雪；春夏欲归来，无那穹窿热；春时欲归来，平中络路绝。”生动道出了当时商贸生活的艰辛与艰辛。

《蛮书》记载，南诏“本土不用钱，凡交易缙帛、毡履、金银、瑟瑟、牛羊之属，以缙帛算数计之，云某物色直若干焉。”后又广泛使用贝币进行交易，《新唐书·南诏传》记载南诏时“以缙帛及贝交易，贝之大者指，十六枚为贯”，这反映出南诏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。南诏对外交往的国家包括弥诺国、骠国、女王国等10余个南亚东南亚政

权，甚至远及波斯、大秦地区，交易货物涵盖水晶、琉璃、珍宝、香料、琥珀等丰富品类。

大理国时期，与宋朝的贸易除朝贡外，尤以马匹交易最著。大理良马为宋廷所需，于黎州、邕州专设“马市”并置买马提举司。南宋于横山寨设博易场大量购马，据说岳飞军中战马多产自云南。除官市外，“边将、商旅私自贸易”亦盛，民间交易尤为活跃。麝香、胡羊、长鸣鸡、云南刀及各类药物云集邕州，内地商贾则携锦缎、豹皮等物前来互市。

礼乐南渐 文脉交融

三国至唐宋时期，中原文化与云南本土少数民族文化持续交融，云南不仅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的沃土，更充当了中原通往南亚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。自三国至隋代，中原文化不断传入

云南，其最具代表性的遗存当数“二爨碑”。《爨宝子碑》与《爨龙颜碑》以隶体文撰写，对仗工整、声律铿锵，在中国书法史上被誉为“神品”。碑文追溯爨氏本为中原少昊、颛顼后裔，迁入南中繁衍生息，清晰反映出南中大姓与中原之间割不断的血缘与文化纽带。碑中对爨氏品德的颂扬，更体现了南中士族对儒家道德观念的高度认同。

南诏政权对中原文化极为仰慕，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《南诏德化碑》记载，南诏王阁罗凤“不读非圣之书”，他重用汉人郑回，正是因其精通儒学。异牟寻在致剑南节度使韦皋的信中，一再强调南诏“人知礼乐”，深受中原文化熏陶；归附唐朝后，更派遣大批子弟前往成都研习礼乐，人数多达千人。南诏王公大臣善作典雅优美的汉文诗歌，如南诏王寻阁功曾在星回节登避风台，与清平官即兴赋诗，其诗境界宏阔：“避风善阁台，极目见藤越。悲哉古与今，依然烟与月。”清平官的唱和之作亦工致雅驯：“河润冰难化，地暖我先开。”

不仅如此，唐代中央王朝与缅甸境内诸国的密切交往，几乎皆经由南诏实现。骠国曾三次遣使入唐，公元802年，骠国王雍羌听闻南诏归附唐朝，命其子舒难陀亲率使团，经南诏一路跋涉抵达长安朝觐。使团献上骠国乐师与舞者共三十五人、乐器二十种，并表演了十二支舞曲。这场充满异域风情的“骠国乐”演出轰动长安，白居易特作长诗《骠国乐》以纪其盛：“玉螺一吹椎髻耸，铜鼓

一击文身踊。珠缨炫转星宿摇，花鬘斗敝龙蛇动。”无论是玉螺、铜鼓，还是舞者佩戴的瓔珞花环，无不洋溢着浓郁的异族风情。此后，骠国又于806年、862年两次通过南诏遣使进贡。此外，缅甸境内的弥臣国等也曾派使者经南诏抵达唐朝。

大理国时期，对中原文化的尊崇有增无减。大理多次遣使向宋朝求购各类典籍，涵盖历史、科技等多个领域。统治者在选拔人才时，尤其重视儒学修养。大理使臣途经文风昌盛之地，常主动请求参观当地学校，瞻仰孔子圣像，并与学子交流切磋。大理国从宋朝大量购入经、史、诸子百家及医药、历算等书籍。1103年，大理遣使入宋，一次便取取经书六十九家、药书六十二部。1173年，大理使臣在横山寨与宋朝贸易时，专门列出所需书籍清单，包括儒家经典、史籍、文学作品、历书、药典等，清单末尾还附诗一首：“言音未意会相和，远隔江山万里多”，深情表达了知己相逢的真挚情谊。宁宗时，大理国请求宋朝赐予《大藏经》，获1465部，归国之后，大理国将《大藏经》珍藏于大理五华楼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唐太宗所撰《帝范》一书共十二篇，五代以后已在中原失传。幸而此书在云南得以保存，大理归附元朝后将其献出，中原士人才得以重睹《帝范》全本——这不仅是一篇文献传承的奇迹，更是云南助力中华文化赓续流传的有力历史见证。

【作者单位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(文献研究所)】

云酒中的两款特色名酒

玫瑰卤酒 杨林肥酒

土师

曾有外地友人调侃：云南是动物王国、植物王国，鲜花美食遍地，可惜有名烟却无名酒，岂非憾事？

此言差矣。他有所不知——早在2012年，云南“玉林泉酒”便已荣膺“中国名酒”称号；他亦不知，云南乃小曲清香白酒的故乡，古今传承的特色美酒遍布城乡，如繁星散落；他更不知，云酒自有其风骨：散、特、少、醇、奇、美。其品质之纯粹，与蜚声中外的云南翡翠，竟有惊人相似——绝世美玉与粗砺砾石之间，孰优孰劣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何须多言？

今日，便为看官细说云酒中的两朵奇葩。

一是玫瑰卤酒。玫瑰卤酒，昆明的传统名酒，是云南人民用植物花卉入酒酿酒的缩影，体现着昆明独有的城市文化和乡愁味道。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《昆明县志》就有“玫瑰酿酒”的记载。清末民初，一位毕姓老板独家酿制玫瑰卤酒经营，因其在店铺前竖着一支锡制蜡烛作为售酒招牌，故被市民称为“毕大蜡烛玫瑰老卤酒”，成为备受老昆明人喜爱并口口相传的玫瑰卤酒品牌。

当年，走亲访友，逢年过节，老昆明人得以能够喝到玫瑰老卤酒为幸事。玫瑰卤酒的酿造，是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、地理、物产与滇人酿酒智慧和高超技艺融合的结果——

用高粱等粮食酿成的小曲白酒浸泡云南特产的玫瑰花瓣，得到玫瑰糟曲，将其蒸餾，得到“玫瑰升酒”，将玫瑰花瓣加入“玫瑰升酒”浸泡后，再蒸餾一次，得到“玫瑰重升酒”。又把玫瑰花瓣加入“玫瑰重升酒”里蒸餾，即得到“玫瑰老卤酒”，如是三加玫瑰三次蒸餾之后，玫瑰花精魂与酒液完美融合，升华为晶莹剔透、玫瑰芳香、清冽甘醇、回味悠长的“玫瑰老卤酒”，成为昆明的城市名片和云酒精品，亦获得诸多殊荣：1964年，被命名为云南省名酒，1980年和1984年被评为省优质产品，1985年获得国家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，1985年、1988年获得国家商业部优质产品金爵奖。

如今，昆明玫瑰卤酒在云南三迤酒业得到了传承和新生——三迤酒业玫瑰老卤酒以非遗认证的酿酒工艺(用昆明水源保护区松华坝龙潭水和云南红缨子高粱，经过8个月制曲、98道工序、3年窖藏匠心酿制)，酿造出了“品质如一、花香清雅、酒体醇厚、回味悠长”的独特传统风味。此酒面市后，得到酒业行业专家的认可和老昆明人的追捧，大家纷纷告，以前的那个玫瑰老卤酒又回来了！

二是杨林肥酒。说起杨林肥酒，就不得不说到咱中国源远流长的美酒文化。自从酒水被古人发明出来后，酒水这个芳香古怪的精灵，这双神鬼莫测的圣手，酿造了多少皇家与庶民醉入仙乡的迷人时光，导演出了无数惊天动地鬼神的历史活剧，铸就了几多朝廷和草野的人间悲欢离合，成就了众多文人雅士文学艺术创作的高峰！

在中华五千多年沧桑巨变的历史画卷

中，无处不散放着酒浆的飘香，随处可见酒浆那勾魂摄魄的肆意欢歌！在人们司空见惯的黄酒、白酒、红酒的阵容里，还有一款名酒，悄然穿越了数千年的人间沧桑，成为了中华酒浆中的奇葩——这就是“绿酒”。有意思的是，款起酒浆，一般人都认为，黄酒在先。其实，在中华酿酒的历史中，最早的酒浆颜色，就是绿色。故方有“灯红酒绿”这个成语。唐宋以前，传统的酿造酒皆呈绿色，芳香沁人，成为皇家朝野、文人墨客的心头最好，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、酒的世界中，留下了众多描写绿酒的优美诗词。

“寿酒千钟绿，官花万叠红。”——史浩《鄞峰真隐漫录》

“酒半半盏春后绿，蜡花全折夜来红。”——华岳《翠微南征录》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”——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

“金风细细，叶叶梧桐绿，绿酒初尝人易醉，一枕小窗浓睡。”——北宋晏殊《清平乐·金风细细》

遗憾的是，古代那些著名的绿酒，如“程酒”“醴醪”等已经失传，世间难觅了。

令人高兴的是，在祖国西南边陲，还有一款绿酒，赓续中华美酒传统，历经岁月风霜洗礼，至今仍生机勃勃，酒香迷人。这款酒就是昆明的杨林肥酒。

相传光绪六年，杨林“裕宝号”商人酿酒奇才陈鼎依据兰茂先生(杨林人，其撰写的《滇南本草》早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140余年，在《滇南本草》中，用酒的方剂，占了全部方剂的四成还多)的“水酒十方”和“药酒仙方”，加入十多味中药(桂圆、党参、枳实、陈皮、大枣、丁香等)，再加入蒸餾提取的竹叶、小茴香等绿色植物色素以及蜂蜜、蔗糖，经过十多道古传工艺，酿造出了翠绿清醇、药味清淡、酒味醇厚、甘美养人的“杨林肥酒”。

杨林肥酒应市后，受到官家百姓一路追捧，酒家门店车马不绝，门庭若市。这一盛况，从清末诗人王迥的《酒趣》诗中，可见一斑：“白玉瓶装绿液浆，好酒应留与人尝。几藏杨林终自饮，犹对空瓶嗅酒香。”杨林肥酒问世后的140多年里，好评如潮，在1910年云南省举行的首届物产品评会上荣获一等奖银质奖，并分别在2011年和2013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“中华老字号”“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”认证。这里要解释一下杨林肥酒的“肥”，并不是有人杜撰杨林肥酒中加了肥肉，而是云南方言中，“肥”和“壮”相通，杨林肥酒以药入酒，酒药合一，有着润肺健脾、补中益气、滋养精血、健身强壮等功效，故称“肥酒”。

【土师款滇菜之九十三·糕点糖酒茶饮品和补品系列·15】



大理洱海。本报记者 陈飞 摄

“要海会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蕴

王茂美

苍山如黛映碧波，洱海含情润各族。大理苍洱大地，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共生之地，汉、白、彝、回等各族群众在此繁衍生息、交往交流交融，共同孕育了璀璨多元的地域文化。“要海会”作为洱海沿岸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俗节庆，其流传千年的两则核心传说，不仅是白族文化的精神图腾，更蕴含着中华民族共通的价值追求，成为联结各族情感的文化纽带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埋下深厚的历史伏笔。

传说溯源：苍洱文脉中的民族精神共鸣。南诏年间，苍洱大地流传着两段可歌可泣的先贤事迹：邓赧诏遭南诏王皮逻阁设松明楼之宴焚亡，其妻柏洁夫人坚守节义，民相传其于农历七月二十三日祭奠亡夫后，抱节投奔直河(洱海支流)殉身，以生命诠释忠贞气节；段赤诚目睹洱海巨蟒残害各族百姓，阻断生计，毅然身缚钢刀与蟒同归于尽，用牺牲换得苍洱安宁。先民感念二位先贤的忠义奉献，驾舟打捞祭奠，代代相传便演化成今日承载各族群众共同情怀的要海盛会。这两则传说绝非白族单一民族的口耳相传，其“勇毅奉献、护境安民、忠贞守节”的精神内核，与中华各民族世代传承的英雄情怀、道德追求高度契合。“守护家园、团结共生”始终是中华民族共通的精神底色，“要海会”正是这种精神底色在苍洱大地的生动具象化，成为各民族精神共鸣的重要载体，见证着苍洱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开端。

信仰共生：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精神根基。“要海会”传说承载的信仰内

涵，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在漫长历史中吸纳融合各民族文化元素，形成兼具地域特色与多元一体特质的信仰体系，成为苍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纽带。段赤诚舍身除蟒的壮举，使其成为白族龙本主信仰的核心图腾，“要海会”也成为祈祝各族安宁的一种方式，承载着白族“万物有灵、敬贤尚义”的信仰。这一信仰体系兼容并蓄，主动吸纳汉族龙文化、彝族自然崇拜等元素——龙图腾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积淀，与汉族龙信仰遥相呼应，“敬畏自然、感恩湖泽”的理念则与彝、回等民族生态信仰高度契合，形成多元共生的信仰格局。柏洁夫人的忠贞气节，使其被尊为“白节圣妃”，形成白族独有的女性圣贤崇拜，既与白族“重母教、尊女贞”的传统相契，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“节义守信”的美德同频共振，得到各族群众广泛认同。在“要海会”活动中，汉、彝等各族群众广泛主动参与，不分民族地域，共同祈愿家园安宁、各族和睦，不断强化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文化认同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基。

价值共守：“要海会”传说凝练的道德、生态与团结理念，在新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，成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撑。道德传承上，柏洁夫人的忠贞、段赤诚的奉献、爱家园”的价值体系，通过“要海会”传承融入民间教化与家风培育，与中华各民族美德一脉相承，为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思想道德根基。生态践行上，传说与洱海生态深度绑定，段赤诚除蟒、柏洁夫人殉身，让洱海成为各族心中的母亲湖，衍生出“人湖共生、敬畏自然”的生态观。如今，“要海会”的放生、敬湖、清理湖岸等做法，成为各民族共同守护洱海的生动实践，彰显中华各民族“天人合一”的生态智慧。群众联结上，“要海会”是各族村寨全民共建的集体盛典，传说成为凝聚各民族情感的纽带，各村寨由长辈、老人会、莲池会牵头筹备，龙舟制作、仪仗编排等环节凝聚各族智慧，强化邻里情谊，培育“同心共德、守望相助”的集体意识。

民俗共乐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。民俗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生动的载体，“要海会”作为苍洱各族共享共乐的节庆，其民俗形态在千年演变中始终彰显多民族交融特质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场域。受两则传说影响，洱海沿岸形成“北祭夫人、南祭英雄”的民俗分野，这并非民族隔阂，而是交融的生动体现：北部邓川、喜洲一带，农历七月二十三会期以彩船竞渡、对歌寄情为主，吸纳汉、彝婚嫁与山歌元素；南部大理古城、下关沿岸，八月初八会期以龙舟竞渡、放生祈福为核心，龙舟竞渡源自汉族，放生祈福融合彝、回等民族的向善理念，成为多民族民俗交融的结晶。如今“要海会”已突破单一民族边界，成为各族共享共乐的文化盛会，让多民族交融可感可触，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力量。

文脉永续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赋能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需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交融基因，让古老民俗焕发新生。“要海会”作为苍洱多民族交融的重要载体，正以全新方式传承文脉、凝聚人心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注入文化力量。如今，“要海会”已纳入大理白族自治州非遗保护范畴，传说在群众日常生活中口口相传，让年轻一代铭记先贤、传承文脉，厚植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理念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代代相传。文旅融合背景下，“要海会”立足多民族交融特色，创新开展传说展演、民俗体验等活动，既保留传统内涵，又融入现代元素，吸引各族群众走进苍洱，推动文化互鉴共生。从南诏口耳相传到新时代创新发展，“要海会”承载着各族的集体记忆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。

“要海会”既是白族的文化财富，更是苍洱各族交融的千年见证，镌刻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印记。它以英雄事迹凝聚正气，以信仰共生联结情感，以民俗共乐促进交融，以价值共守汇聚合力。新时代当坚守文化自信，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本土文化，挖掘其交融基因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，让民族传统节日成为凝聚民族情感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的重要力量，让苍洱文化之花在各族同心浇灌下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。

【作者单位：云南师范大学法政与社会学学院】